

# 京剧大师的悲欢

在大半个世纪的动荡岁月中，京剧名角们的人生和作品构成一种强大的魅力，也为电影提供了绝好的题材。他们也只有舞台上，能抬头挺胸，挥洒自如，实现一切关于美满人生的梦想。

文 / 陈艳涛

1895年，世界上第一部电影在卢米埃尔兄弟的手中诞生。电影在各国诞生之初，法国卢米埃尔兄弟拍的是火车进站，美国人拍的是水浇园丁，而中国人却用无声的黑白片，纪录了京剧名角谭鑫培的《定军山》。

## 辉煌的巅峰

第一代中国电影人颇有眼光，纷繁丰富的京剧值得成为电影题材，而京剧名角们更值得大写特写。舞台上，他们演绎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将中国文学和历史揉碎在优美的唱腔和身段里；舞台下，他们的人生境遇起伏跌宕，在大半个世纪的动荡岁月中，他们的人生和作品紧紧关联在一起，构成一种强大的魅力，也为电影提供了绝好的题材。

今天的人们无法想象上一辈人对京剧名角的痴迷，隔着几十年的岁月，《粉墨春秋》剧组采访的老人还能清晰地描绘杨小楼的风采，他们陶醉地反复描述着杨小楼的出场：他抱着一把刀，半闭着眼，突然一睁眼的那种气势，把所有人都震蒙了。这让《粉墨春秋》导演蒋樾记忆深刻，“今天舞台上的演员，有的人比杨小楼的腿踢得还高，唱念做打都不差，但他们就是认为没有杨的味道和气派，这就是名角的魅力。”

电影《梅兰芳》里的十三燕，就是当年第一部电影《定军山》的主角、伶界大王谭鑫培。他以“云遮月”的独特嗓音，赢得“小叫天”名号，让清末北京城“满城争说叫天儿”。也正是他，创立了京剧名角儿制，让京剧进入最繁华最热烈的时代，众多名角纷纷闪亮登场。在这个意义上，谭鑫培不仅是中国电影的开端，还是京剧名角艺术的开启者。

作为国剧，京剧艺人与政治风云有着最紧密的接触，他们身不由己地一再被推入时代的洪流当中。早在辛亥革命时期，在攻克上海制造局的战斗中，打头阵的，就是会武功的京剧演员。潘月樵、刘艺舟、夏月珊和夏月润等艺人都参加了辛亥革命，手持武器冲在最前面。这些京剧艺人希望通过奋不顾身的革命，改变屈辱的社会地位。但革命并没有改

变他们的卑微，梨园行就是他们的宿命。艺人们又回到了他们所熟悉的舞台上。也只有舞台上，他们能抬头挺胸，挥洒自如，实现一切关于美满人生的梦想。

1918年，《新青年》辟专号讨论中国戏剧的前途和戏剧改良问题，胡适、刘半农等人批判京剧，认为它只是“玩把戏”，“毫无美学价值”。仿佛是一个响亮的回应，梅兰芳在此时连续推出了《黛玉葬花》和《天女散花》等古装新戏，轰动了整个北京。而京剧和名角的魅力，也分化了当年的文学阵营：他们不去欣赏易卜生了，转而拜倒在梅兰芳的天女和黛玉台下。这其中，包括胡适、顾颉刚，徐志摩甚至还男扮女装上台去票戏。

此时，仍旧斩钉截铁讨厌京剧的阵营中，只剩鲁迅和周作人两兄弟。鲁迅认为梅兰芳当时的表演是“扭扭的黛玉葬花”和“缓缓的天女散花”，而京剧是“一大班人乱打”“两三个人互打”，一向对中国现实有着清醒而深刻认识的鲁迅，在京剧这件事上却判断错了。京剧和名角们此时已迈入辉煌的巅峰期。

电影《梅兰芳》中设置了一个重要的角色朱慧芳，年轻时大红大紫，风光无限，后来却渐渐落魄，晚景凄凉。他是京剧男旦的一个悲辛侧写。京剧是个残酷的行当，在《粉墨春秋》的结尾，所有的老艺术家几乎异口同声地说：吃开口饭不易。无论时代给他们怎样的头衔。由朱慧芳身上，能看到曾雄踞净行首席的花脸金少山一点影子。金少山的人生，是彼时伶人的一个侧影：他性格豪爽，仗义疏财，大红大紫时常常解囊助人，毫不吝惜，花钱无度，最终却晚景凄凉，才50多岁就贫病而终，惨死在街头。

在激烈的竞争中，京剧名角们唱对台戏能唱到吐血。梅兰芳和程砚秋就曾经在上海大唱对台戏。篆刻大家陈巨来在《安持人物琐忆》里回忆说，当年上海黄金剧院请梅兰芳和马连良合作，皇后剧院请程砚秋和杨宝森合作，大唱对台戏。梅剧团当时随票附赠一本厚厚的特刊，多是梅兰芳剧照，其中有一张照片是梅兰芳昔年演“上元夫人”时的剧照，梅饰演的上元夫人居中，下跪四宫娥分别是：程砚秋、王蕙芳（朱慧芳原型）、姚玉芙和魏莲芳。程砚秋初入行时是梅兰芳的配角，程看到这本特刊后，去找梅兰芳。梅听说后连连道歉，并将之前所印的5000册特刊，全部

交付程砚秋带走。梅兰芳这边的黄金剧院每晚满座，而皇后剧院只上七成座，自那以后，两家剧院势同水火。

## 一次重创

日本人的入侵打乱了一切。在国难面前，京剧艺人们也面临着严峻的考验。为了保住气节，一些名演员纷纷罢演，而大多数傍角儿的演员，只能纷纷改行。

北平沦陷后，当时的特高科特务欺负梨园行的人，经常在火车上往戏箱里倒硝酸，毁坏戏服。一次程砚秋与他们发生冲突，一伙汉奸想要殴打程砚秋，结果反被他打得落花流水。此后特务们频频想找麻烦，却不料程砚秋从此辍演，搬到北京郊区的青龙桥锄地务农去了。

而梨园界更加广为传颂的是梅兰芳的蓄须明志。梅葆玖回忆说：“父亲舞台罢歌、闭门谢客，闲下来的他，请了俞振飞来研唱昆曲，请画家汤定之教画松梅，还专请了一位英国老太太教学英文。他警惕着各方面的诱骗和袭击。父亲一向爱好整洁，注意仪表。特别是演出期间，每天都要刮脸，有时用镊子将胡须一根一根地拔掉。日军占领香港前后，他却开始不刮胡子了，与昔日相比，明显不修边幅，与从前判若两人。他早已下定决心，不为日本人和汉奸演戏，他希望这一小撮胡子能起到挡箭牌作用。”梅兰芳曾说“如果硬逼着我剃胡子演戏，那么坐牢、杀头也只好由他。”

对于京剧艺人来说，保持气节并不容易，以梅兰芳当年的地位，不唱戏之后，还要变卖古玩、家当，银行透支，那些普通的、毫无积蓄的艺人境遇之惨可想而知。

1945年8月15日，抗战胜利。梅葆玖清晰记得这个时刻，当天，他的父亲梅兰芳用折扇半遮面，从楼梯上一步一步地走下来，“家里人都呆了。父亲猛地把扇子一抽，大家才看到他唇须剃掉了，脸上刮得干干净净，大家围着他鼓掌，那天他真是很高兴。”

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是对京剧艺术的一次重创。抗战胜利后，再次重返舞台的大师们普遍遭遇了尴尬和无所适从。8年不上台的梅兰芳、程砚秋、荀慧生、尚小云此时都胖了，程砚秋和荀慧生一出场观众就大笑，他们的戏迷看完之后却很伤心。人们甚至戏称当年风姿绰约的四大名旦为“四大名蛋”。



从小学戏，熟悉行内掌故的刘曾复老先生，当年与程砚秋同住在报子胡同，他回忆说，程一出门，他的女儿就笑着说：“那个大胖子又出来了”，“我想那样子上台就没法看了。”

而那些抗战时还接着唱的演员，此时境遇更惨，比如马连良，抗战胜利后即陷入“马连良汉奸案”，他只有远走香港。与他一起赴香港的，还有孟小冬、张君秋、杨宝森等名角。新中国成立后马连良才又回到了北京。

对京剧艺术而言，更大的损失是，抗战期间京剧舞台上的两位大师相继离去。1938年，武生泰斗杨小楼死于肺癌。1943年，四大须生之首余叔岩死于膀胱癌。杨小楼空前盛大的葬礼，让很多老人几十年后还记忆犹新。有戏曲评论家甚至曾在报刊上发表文章说，梅兰芳建国以后就不应该再演《霸王别姬》，因为他再找不到杨小楼这么好的霸王，没有了这个绝世的霸王，他又何苦再唱他的虞姬？

## 中兴和变革

1949年，京剧艺人们在兴奋和微微的不安中迎来了新中国成立，不安是因为解放初禁演了不少剧目，比如《四郎探母》等，此时带色情的戏不能唱，神鬼的不能唱，断案的不能唱，忠于皇帝的不能唱，选来选去，似乎只有反映老百姓反抗精神的《打渔杀家》符合要求。

但对京剧名角来说，这又是京剧的一个繁荣期，京剧大师“四世同堂”的局面前所未有，至今让老戏迷们怀念。1949年7月，第一届全国文代会上，京剧演员第一次被称为文艺工作者、表演艺术家，很多人激动地泪流满面。从前为生计所迫，自称“为窝头服务”的京剧演员们开始“为人民服务”了。艺人们离开他们赖以生存的剧场和舞台，走到民众中去。

尚小云曾经带着他自己的剧团走了大半个中国，不仅在工厂，而且在部队演唱。时年已五十多岁的尚小云演昭君出塞，在台上能跑三十个圆场，而台下的战士为了看演出，能在大雪天里一动不动地坐四个小时。

北京京剧团成立时，汇集了马连良、谭富英、裘盛戎、张君秋、赵燕侠五大头牌，从前根本不会同台演出的“对头”马连良和谭富英竟然聚在了一起。谭元寿老先生回忆说：他父亲和马连良在天桥剧场合演一出《龙凤呈祥》，谭富英是刘备，马连良

是乔玄，第一场两人一碰面，还未开口，观众已经沸腾了，鼓掌鼓了有一两分钟。

此时，京剧舞台上出现了名角儿合家欢的盛世。以梅兰芳、马连良、程砚秋等为首的前辈艺术家和后几代名角都能同台演出，令当时的观众大饱眼福。这是京剧的一个中兴时代。

但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起，程砚秋、杨宝森、王少卿、杨盛春、王瑶卿、郝寿臣、梅兰芳等一批京剧大师相继离世。梅兰芳的离世，标志着以梅兰芳、杨小楼、余叔岩为代表的京剧三大贤时代的彻底结束。此时，依然活跃在舞台上，能够称得上是划时代领军人物的，就只剩下四大须生之一的马连良。

1952年才回到北京的马连良再次充满热情地站在舞台上时，他没有料到，京剧舞台正在发生着一场巨大变革。

对传统京剧有很高鉴赏力的毛泽东，却认为在新中国的舞台上，不能再上演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江青“四人帮”一伙趁机迫害老一辈京剧艺术家。从1964年初开始至“文化大革命”期间，传统戏被彻底赶出了京剧舞台。

从此，在京剧舞台上活跃了100多年的男旦消失了。同时消失的，还有女老生、女花脸。张君秋弟子、才32岁的吴吟秋万念俱灰，离开了舞台，改行去打追光。王瑶卿的弟子于玉衡，到戏曲学校当了教员。那些习惯了穿靴子、抖水袖的演员第一次穿上了中山装，习惯了传统戏表演程式的他们，在现代戏的舞台上迷茫了。

1964年，马连良与张君秋排演现代戏《年年有余》。16岁就被推选为四小名旦，与孟小冬、谭富英、马连良都合作过的张君秋，在这部戏里第一次穿起了现代装。从前的华美戏服、长长水袖可以修饰的男人身体，现在暴露在观众眼前，他带着假发，不得已垫了假胸，以很别扭的形象出现在舞台上。但名角就是名角，一开口还是满堂喝彩。

一批老艺人也因为不适应现代戏被淘汰了。这其中，包括大师马连良。此时他只能在革命现代京剧《杜鹃山》里演一个小配角儿——打大旗的郑老万。大红大紫了半辈子的马连良愿意演这些小角色，他也愿意跟着时代走。但拿惯了扇子等传统道具的老先生，现在要拿枪，他的手开始晃悠了。在一场戏里，他的胡子竟然掉了下来，可以想象，他的艺术生命终止于此。

1966年12月13日，马连良想吃米饭，但是食堂没有。他买了一碗面条端着，一头栽倒在中和戏院的台阶下。他被埋在香山，墓碑上连他自己名字都没写，京剧界一个如雷贯耳的名字消失了。同时结束的，是一个京剧时代。舞台的大幕再次拉开，这一次开始的，是样板戏。

【责任编辑/伍文峰】

## 文 / 王熙章

董希文1914年6月27日出生于浙江绍兴，先后就读于杭州艺专、苏州美专、上海美专、杭州国立艺专以及越南河内巴黎美专分校等艺术院校，师从艺术大师林风眠、颜文良、刘海粟、常书鸿等前辈，刻苦学习中西方绘画艺术。

1938年抗日战争爆发，董希文随杭州艺专迁徙于贵州、云南。1943年，他又到大西北的劳苦民众中体验生活。在此期间，他曾下苦功用三年时间临摹了大量敦煌壁画，并结合现实生活进行创作，在油画民族化的道路上迈出重要一步。

1946年，经吴作人、李宗津推荐，董希文来到国立北平艺专任教，并参加了迎接北平解放的斗争。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董希文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随后，他担任中央美术学院教授、中央美院董希文工作室主持人、全国政协委员等职，先后创作了《北平入城式》《新解放区的生产自救》《抗美援朝》《打击侵略者》《春到西藏》《红军不怕远征难》《百万雄师过大江》《千年土地翻了身》等革命历史画，以及大批长征路线、西藏写生等作品，受到广大人民群众和美术界热烈而持久的称赞。

1952年初，董希文承担了创作油画《开国大典》的重任。对董希文先生来说，创作《开国大典》决不是偶然的。如果没有深厚的中西绘画的艺术功力和广博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素养，没有在新中国食不果腹、颠沛流离的生活体验，没有经历北平人民欢庆解放，对新中国充满希望，是难以承担这样巨大的艺术工程的。早在1949年筹备开国大典前，董希文就曾主持并参加了毛主席像和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起草绘制工作，开国大典时天安门城楼上那幅毛主席戴着八角帽的巨幅画像，就是董希文带领学生绘制的。1949年10月1日，董希文幸福地参加了开国盛典。那天，